



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百年中銀 與您同行
A CENTURY OF SERVICES, ALWAYS WITH YOU

中銀香港的奠基人貝祖詒

貝祖詒，字淞孫，江蘇吳縣人，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生。貝家為吳縣商業世家，富甲一方，貝祖詒自幼受其家庭影響，對經濟商業事務興趣較多。

投身中國銀行

少年時代的貝祖詒，在鄉讀私塾，接受的是傳統教育。1903年，貝祖詒前往上海，入澄衷中學學習。1907年，自澄衷中學畢業後，考入家鄉蘇州東吳大學中學部，進入高中階段的學習。1911年畢業後，又進入河北唐山路礦學堂學習了兩年。如此，貝祖詒接受了較為系統的現代教育，為他以後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3年，貝祖詒重回上海，擔任漢冶萍煤鐵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會計。1914年3月，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擔任司賬，由於他勤於職守，努力鑽研業務，很快即成為一名業務中堅。1915年，貝祖詒調入中國銀行廣東分行，先後任代理會計主任、總會計師兼營業部主任。為適應工作需要，更好地與當地人打交道，貝祖詒到了廣東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即學會了一口流利的粵語。

1917年9月24日，中國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號。1918年，貝祖詒前往香港負責相關工作。1919年2月，香港分號改為分行，貝祖詒擔任經理直至1927年，成為中銀香港的主要奠基人。他在香港分行經理任上，最大的成績在於擴充國外匯兌業務。當時，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檀香山，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東南亞的新加坡、暹羅（泰國）、菲律賓、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華僑的收入需要匯回國內。為了爭取這一部分客源，香港分行積極改善服務，改革取款匯兌的手續和方法。同時，針對不少僑胞文化水平低的情況，同意凡屬不能簽字者，准其畫「十」字為證；凡僑胞不願攜帶現金回鄉者，可代為委託批局轉解。上述舉措效果顯著，更多的僑匯通過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轉匯國內。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吸收了大量外匯資金，獲利豐厚，成績顯著，成為當時僑匯轉匯內地的樞紐行。1924年3月，貝祖詒因「經營有方，擴充國外匯兌增利不淺」，受到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表彰，並「從優加薪」。

支持國民革命事業

貝祖詒在廣東和香港任職期間，正值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南方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相抗衡。貝祖詒密切注意局勢發展，提出相應對策，並與孫中山南方政府中的財政要員宋子文等保持著較好的私誼。

1923年2月，孫中山領導的軍隊擊敗陳炯明的部隊，孫中山重回廣州，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繼續革命事業。同年12月20日，孫中山下手令給中國銀行廣州支行，將廣東鹽務稽核分所前存稅款11萬元交給分所所長宋子文，並由陳友仁出面向會計主任索款。廣州支行從中行一貫的財務制度出發，拒絕提付。雙方關係惡化，大元帥府一度下令通緝廣州支行行長。直到1924年8月1日，孫中山任命宋子文為廣東中央銀行行長。中國銀行派福建中行副行長舒石文和總管理處張宗英出面，向宋子文等進行疏通，雙方關係才得以緩和。

宋子文擔任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後，廣州市面金融混亂，中央銀行因缺乏準備金而濫發的紙幣毫無信用，造成兌現竭蹶、通貨膨脹、羅掘俱窮的現象。宋子文為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提高廣州中央銀行紙幣的信用，曾諮請廣東省政府出示佈告：「凡一切交易款項出入，對於廣州中央銀行紙幣應一律通用，並隨時持向該行及兌換所兌換，現已設兌換所兩處，並委託八家銀號為代兌機關。」為了籌備充足的現金，防止出現無法兌現的情況，宋子文派人至香港，向貝祖詒拆借部分現金。貝祖詒不敢擅自做主，秘密電告身在北京的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請示。張嘉璈密囑貝祖詒前往廣州，與宋子文面談，幫助廣州中央銀行整理紙幣，並藉此機會聯絡感情。

貝祖詒與宋子文見面後，宋子文向貝祖詒提出借款200萬元，貝祖詒答覆說：「二百萬元不是個小數字，我做不了主。這樣，我先借給你五十萬元先用，待請示總行張副總裁嘉璈同意後，再續借。」宋子文見貝祖詒是個爽快人，彼此有較好的印象，雙方很快便由業務關係轉為朋友關係，貝也因此而在以後成為宋的親信幹才之一。廣州中央銀行得到這筆現金後，作為準備金，用以整理金融，其發行的紙幣才逐漸得以流通。1926年7月，當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兵北伐時，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電令出發各部隊：「我軍達到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表示了對中國銀行的支持。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初時，所轄地域有限，經濟來源不多，籌備各項用款頗為困難。蔣介石恣意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借款，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是個職業經理人，一切照章辦事，與蔣產生了矛盾與衝突。中行總經理張嘉璈認為：「宋經理對於總司令部軍需處借款事，既按銀行向例作風應付，引起雙方不快。誠恐此後應付新政府人物，難免不再發生類似情事。我頗有調香港分行經理貝祖詒任滬行副經理，協助宋氏之意。會宋經理忽患神經衰弱重疾，極需靜養，自專任常務董事，因調貝祖詒繼任。」1927年7月，貝祖詒調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並在此崗位上坐了十八年。

貝祖詒上任後，與南京國民政府保持了和諧的關係。自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共發行國庫券與公債13,600萬元，均由銀行界先行墊款，然後再發售，其中以中行上海分行所佔比例最大。

宋子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以中央銀行作為國家最高金融機關，而將中國銀行改組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並將中行總部從北平遷往上海。1928年11月17日，中國銀行第十一屆股東會在上海召開，600多名股東到會，會議選出商股董事12人，貝祖詒首次成為董事。會後，貝祖詒出任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主任，同時兼上海分行經理。

事業愛情兩得意

中國銀行的性質改變之後，國際匯兌成為主要業務。1931年底，中國銀行實行新的組織大綱，貝祖詒身兼國外部與信託部經理，成為中行的重要負責人之一。

1931年的夏季，貝祖詒以考察歐美銀行名義遠赴歐洲，在倫敦泰晤士河畔，恰遇18歲的蔣愛玲。當時難得在異國他鄉遇到中國人，何況兩人一開口交談，皆為吳儂軟語，原來兩人還是同鄉，便有說不完的話，遂結伴同遊。貝祖詒年近不惑，正斷弦待續。蔣愛玲開學在即，正準備返回法國，貝祖詒立即趕到巴黎，向蔣愛玲求婚。蔣毫無思想準備，再加上兩人年齡懸殊，猶豫不決。

原來，蔣愛玲的父親蔣履福是個外交官。1930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任命蔣履福為中國駐意大利代辦，同年6月，蔣履福偕家眷到任。途徑法國巴黎時，父親將蔣愛玲留在當地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讀書。在學校放長假的日子裡，蔣愛玲到歐洲各地旅遊，結果在倫敦邂逅貝祖詒。愛玲的姐夫唐在均，時為中國駐德國漢堡領事，聞訊後夫婦兩人趕赴巴黎，但意見無法統一，最後決定請蔣履福前來定奪。或許是蔣履福與貝祖詒有緣，見面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當即許婚。貝祖詒與蔣愛玲的婚禮，遂在中國駐法國公使館舉行。婚後不久，新婚夫婦回到上海。

20世紀30年代中期，貝祖詒積極參與、推動了中國的幣制改革。中國向來以白銀為貨幣，所有的銀兩由民間自由熔鑄，重量與成色以及與其他貨幣的換算比率都沒有統一規定。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統一並壟斷金融，必須統一貨幣的發行權，而要實行貨幣的統一發行，則必須實行廢兩改元。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銀行為了自身業務的發展，也一直推動政府實行廢兩改元政策。

1932年7月，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與錢幣司司長徐堪分別到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討論廢兩改元問題，同時組建了一個廢兩改元研究會，由中國銀行貝祖詒和外商銀行代表及專家等七人組成。該研究會的英國專家穆叔脫認為：中國近期實行廢兩改元的時機不成熟，須待十年或二十年之後，等到新銀幣準備充足才能實行。貝祖詒則就立即實行廢兩改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進行了論述，並批評了穆叔脫的觀點。此外，貝祖詒還對外國銀行和一部分錢業界代表懷疑實行廢兩改元後，可能濫鑄銀元和濫發紙幣並擔心銀元供不應求等等顧慮，一一進行了解釋。貝祖詒代表中國銀行聲明：中行對發行紙幣準備進行公開檢查，決不濫發紙幣；而且庫存銀元充足，隨時可供應市面。

幣制改革的關鍵是需要貨幣匯價穩定，而匯價穩定的關鍵，在於有足夠的匯兌基金。1934年秋，貝祖詒和李銘在上海與匯豐銀行磋商，希望得到匯豐銀行的借款或貸款，藉此來支持銀本位的市場。匯豐銀行經理也希望借款成功，使中國能夠保持自由銀本位，但因借款須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而英國財政部對此不抱信心，借款談判暫時停頓下來。之後，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曾向美國提出貸款，並打算將銀本位改變成與美元聯繫的新幣制，但也遭到美國國務院的反對。國民政府在借款不成、售銀有限的背景下，迫於國內金融形勢，決定獨立進行貨幣改革，並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美國對法幣與英鎊的聯繫深感不安，遂提出以法幣與美元掛鉤等條件，收購中國的白銀，以增加法幣的外匯基金。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的外匯基金只有3,000萬美元，實行法幣政策以後，出售白銀換取外匯，增加了外匯基金。法幣與英鎊、美元實行固定匯率，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三行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使法幣對外匯價基本趨於穩定。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展開。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根據財政部指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往南京，同時在香港和漢口設置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和駐漢辦事處，國外部及信託部隨同總行駐港辦事處一併移設香港，總行大部分處、室均移港辦公。按照中行章程原規定：中行只設總經理一人。隨著戰爭繼續，行務日趨繁重。1938年4月，為適應戰爭形勢需要，中行決定增設副總經理一人，由貝祖詒擔任，同時仍兼任上海分行經理。國民政府為了大力吸納民間閒散資金，

推進小額儲蓄，決定擴大儲蓄網點。宋漢章和貝祖詒從香港致函各分行經理，要求從速著手籌備，積極進行，並於1941年4月制定了《中國銀行籌設簡易儲蓄處辦法綱要》，規定各分支行處，應選擇相當地區，呈准總處籌設。到是年年底，中行新設簡易儲蓄處64處。此項措施對抗戰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人員陸續撤回重慶。1944年，貝祖詒以中國代表身份出席在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

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時，宋子文已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作為宋的親信，貝祖詒於1946年2月26日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

戰後中國經濟面臨著復興重建的艱巨任務，宋子文衡量形勢，決定實行金融開放政策，同時決定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為基礎，以官定價格通過上海黃金市場買賣，借此回收過量發行的法幣，吸取民間游資，穩定通貨，並給金融開放政策以有力支撐。1946年2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開放外匯市場的決議。3月1日，貝祖詒到央行走馬上任，專心處理買賣外匯和配售黃金事宜。3月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宣佈實施《管理外匯暫行辦法》、《進出口暫行辦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將法幣外匯定價定為1美元合法幣2,020元，指定中外二十七家銀行及少數行號經營外匯買賣。

貝祖詒上任之初，國共和談正在進行，外匯法定價格與黑市價格相差不多，外匯供應比較寬裕，再加上黃金配售，中央銀行擁有外匯資金約8億多美元，黃金600萬兩，還有大量的敵偽產業以及美軍剩餘外資和聯合國救濟物資，可以隨時運用，使得外匯市場比較穩定。但到了1946年7月，內戰全面爆發，外匯市場形勢逐步惡化，外貨湧進，民族工業難以與之抗衡，瀕於破產。經宋子文首肯，8月19日，貝祖詒將外匯匯率提高到法幣3,350元對1美元。消息一出，國內外輿論大嘩。

外匯匯率第一次調整後，不但黑市外匯水漲船高，物價也跟著大幅度地上漲。宋子文、貝祖詒迫不得已，只有大量拋售黃金，最多時一天拋售10萬兩，以穩定黃金官定價格。1946年12月，售出黃金78萬餘兩，1947年1月，售出黃金67萬餘兩。宋子文、貝祖詒還修正了進出口貿易辦法，企圖減少外匯供應。然而，外匯供應越少，外匯黑市價格越高，套匯、逃匯之風愈烈。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銀行因庫存黃金接近枯竭，不得不宣佈停售黃金。

上海黃金風潮爆發，導致經濟危機，引發全國社會動盪，輿論嘩然，宋子文因而成為眾矢之的。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照准，由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貝祖詒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也由張嘉璈替代。

貝祖詒自中央銀行卸職後回到中國銀行，繼續擔任副總經理。1947年8月，陳光甫辭去中行常務董事一職，由貝祖詒接替。1948年，貝祖詒任中國技術代表團團長，前往美國，商談有關爭取美國援助問題，但沒有結果。此後，貝祖詒定居美國，曾任美亞保險公司董事長、紐約斯泰公司顧問。1954年以前，中國銀行仍為他保留了董事席位。1962年，貝祖詒出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1973年退休，結束了他的銀行家活動，此後定居紐約。

張嘉璈對貝祖詒曾有這樣的評價：「貝為中國銀行家，亦為國外匯兌與國際金融專家。一生為中國銀行及國家財政金融服務達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國銀行時間最久，計三十三年。中國銀行國外匯兌業務之創辦與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後，其地位之確立與業務之擴展，貝氏貢獻甚大。中國幣

制於1935年改為法幣及抗戰期間法幣之維持一切措施，貝氏參與協助，尤著功勳。」這是對貝祖詒為中國民族金融業所作貢獻的中肯評價。

1982年12月27日，貝祖詒在紐約逝世，享年89歲。

(載於《大公報》)